

百家小集
⑥



那些人， 那些事

蓝英年
著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—— 那些人，那些事 ——

蓝英年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些人, 那些事 / 蓝英年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
2014.8

(百家小集)

ISBN 978-7-218-09365-9

I. ①那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0401号

Naxie ren, naxie shi

那些人, 那些事

蓝英年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特约编辑: 陈大钢

责任编辑: 梁茵

装帧设计: 张绮华

责任技编: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9365-9

开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张: 6.5 字数: 120千

版次: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序

我一向爱逛书店，翻翻这本翻翻那本，一本本翻过去。遇到喜欢的，站着多翻一会儿，但也不一定买。逛书店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。但有一阵书上架了，要看哪本书得请售货员从书架上取，很不方便，乐趣减去了一半。好在这种售书方式很快就取消了，又恢复了原有方式。但不久新的变化也随之出现：书架上十六开本的大书、硬皮书（精装版）越来越多。什么外国文学名著、中国当代优秀小说、中国名人传（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）以及中国通俗历史小说如《七侠五义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狄公案》等。这种书像一块砖头，拿起来费劲，而且只能放在桌子上正襟危坐地阅读，像我们古人那样。难道书商培养我们端坐桌前，振作精神，像古人那样聚精会神地读书吗？不大可能。在信息化的今天，谁还会有这种糊

涂的想法？书商关注的是经济效益：十六开本的特大精装书总比三十二开的平装书价钱贵吧。但谁又会买这种拿不动、翻不开的铁衣铁帽硬皮书呢？我的侄女婿给我解答了这个问题。十几年前我在他家住过，发现他两个书架都摆满了书。我知道他是个整天忙于事务，从不读书的人。我多次劝他读点书，做个有文化知识的人。我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读书了，我对他说的话没白说。可是他的回答让我惊愕不已：“叔叔，这是人家送的礼品书，现在时兴送礼品书，表示风雅。”原来印得这么大这么厚的书是送人的礼品，一种赚钱的新手段，谈什么风雅！

我喜欢睡觉前，或疲倦的时候，或在医院等待叫号的时候随便翻书。上面提到的那种大书根本无法读。我读的都是篇幅不长的、大小三十二开本的书，因为这种书大多是内容多样，集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，引人入胜。家里也没有一本十六开本以及十六开本以上的硬皮书，因为哪个书架也叉不进去。

向继东兄准备出一套小开本的“百家小集”，邀我加盟。我对这种阅读方便的小开本书喜不自胜，欣然从命。从旧作中选出二十余篇，一半以上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，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曾收入集子；也有过去收入集子，且还有些情趣的文章一并编入这本小册子。我想“百家小集”定会受到读者欢迎。书不贵，随身带，随时看，磨损了或丢了也不值几个钱。

感谢曾昭华女士帮我细心审阅文稿，改正错字或不顺的句子。她是我的老学生，一直在报社担任编辑，有丰富的看稿经验，错字、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都逃不过她的眼睛，对《那些人，那些事》也付出了心血。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于北京

—
目次
—

辑一 记 忆

- 002 在梁漱溟家过夜
007 掉了皮的纪念册
012 长忆吴牛喘月时
019 话说张东荪
034 怀念蒋路
048 流沙河
053 且与鬼狐为伍
072 道旁甜李
076 在苏联办年货

辑二 悦 读

- 082 世事关心天地间
——读资中筠的《斗室中的天下》
- 093 暴风骤雨的年代
——读袁鹰的《风云侧记》
- 099 话剧《彼得大帝》彩排记
- 105 诠释西蒙诺夫抒情诗《等着我吧》
- 112 与果戈理对话
- 126 果戈理没结婚
- 132 姑娘为何变成老马
- 137 可当史书读
——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序
- 146 共产国际的收支
- 156 “向帕夫利克看齐！”
- 170 俄国人眼里的康生

一
辑
一
记
忆
一

在梁漱溟家过夜

二〇〇〇年春天，边区联中老同学在北京聚会。五十三年前大家曾在一间茅舍里读书。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成白发翁媪了。吃午饭时我同魏扬坐在一起。他忽然问我：“你还记得游颐和园的事吗？”我马上想起来，说道：“当然记得。”两人抚掌大笑。

一九五〇年我们还是中学生。深秋的一天，我同魏扬、周虎游颐和园。他们两位都没去过颐和园，只有我一人小时候去过。我带他们从知春亭出发，沿昆明湖绕了一圈。后来爬上后山，在一所小院前休息。小院前挂着一块“闲人免进”的牌子，院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靠墙有一棵槐树，魏扬爬上

树往院子里张望，说了句“里面没人”便翻墙跳了进去。周虎是爬树高手，也爬树翻入院里。两人在院里喊：“没人，快进来！”我也翻墙过去，两脚刚一落地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两名公园职工，把我们当场抓住。一位职工问我们：“看见门上的牌子没有？”我们身上虽有游击习气，但对明显的事实也无法抵赖。我们被带到石舫附近的公园管理处。管理处的一位干部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，马上给学校打电话。我们老师说了很多道歉的话，并说回校一定严厉批评我们。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，当时只听见管理处干部说：“好吧，我们马上放人。”可我们万万没想到管理人员会如此惩罚我们。他没立刻放我们，跟我们聊了半天，还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吃晚饭。直到八点静园后才放我们回校。我们走到大门时看见双门紧闭，周围没有一个人，只得往回走。起初东走走西走走，还觉得蛮有诗意，有一种“倘遣名园长属我，躬耕原不恋吴江”的感觉。天渐渐黑下来，诗意变成不安。我们到哪儿过夜？周虎说他舅公梁漱溟住在颐和园，可以在他那儿过夜。可梁先生住在哪儿？无人可问。只好敲旁边一个小院的门。两次被警卫员赶走。第三次敲出一位中年妇女，态度和蔼，告诉我们：“这是柳亚子先生住宅，梁先生住在石舫旁边。”我们总算找到过夜的地方了。敲开梁先生的门，我们被带进北房，见到梁先生。记得他上身穿白布对襟褂子，下身穿着白裤子，等他问清我们为何“晏夜来访”后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连声说：“勇

敢！勇敢！”他大概还说了别的话，但我一句也记不得了。他让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东厢房睡觉。第二天清早，我们没同梁先生告别，对服务员说了一声便走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。他同我们呆了不到半小时。

以后再没见过梁先生，也没有他的消息。一九五四年听说梁先生犯了错误，说什么“工人在九天之上，农民在九天之下”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。一九七七年《毛选》第五卷出版，我才读到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》一文，比我听到的尖锐得多。对梁先生的批评是因他在政协的发言引起的。我在《梁漱溟全集》中找到这篇发言稿。梁先生最后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：

“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，依靠农民。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，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，但进入城市后，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，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。一切较好的干部都来城市工作，此无可奈何者。然而在……今天建设重点在工业，精神所注更在此。生活之差工人九天，农民九地。农民往城里跑，不许他跑。人力才力集中都市，虽不说遗弃吧，不说脱节吧，多少有点。虽然农民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农民。对人民照顾不足，教育不足，安顿不好，建国如此？当初革命时，农民受日本侵略，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，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，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。”

（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七卷，第五~七页）

梁先生坦率批评中共的农村政策，希望中共改正，在建国方面做得更好。不少与会者也是这样理解的。但梁先生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。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后，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，并上纲上线到“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”，“就是帮助了美国人”的高度：“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，认为农民生活太苦，要求照顾农民。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。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，照顾农民是小仁政，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。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，就是帮助了美国人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第一〇七页）。梁漱溟不服，给毛泽东写了几封信：“听了主席的一番话，明白实为我昨日的发言而发，但我不能接受主席的批评。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，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。主席在这样的场合，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。不仅我本人受屈，而且会波及他人，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？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。”（《梁漱溟问答录》，第一三三页）梁漱溟再次发言后受到严厉的批判。周总理讲话时，毛泽东频频插言，痛斥梁漱溟，说他是“一个杀人犯”：

“……讲老实话，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，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。杀人有两种，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，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。伪装得最巧妙、杀人不见血的，是用笔杆子杀人。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！”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第

一〇七~一〇八页)

一九八三年，周虎带我到木樨地看望梁先生。梁先生已经很衰老了，但谈话仍有精神。他谈的很多，我已记不清楚都谈什么了，只记得他说：“我的错误是让润之下不来台，但我的话并没错。”

一九八八年六月，我参加了梁先生的追悼会。那天下着小雨，我来到北京医院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。参加追悼会的大约四十人，我鞠了三个躬便离开了。出门时看见小屋门楣上贴着一张旧报纸，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：中国脊梁。不知为何我进门时没看见。我想很多人也未必看见了。

掉了皮的纪念册

济南《老照片》的编辑问我要老照片，我说没有，“文革”期间都烧毁了。编辑还是让我找找，万一有“漏网”的呢？我只好翻箱倒柜找起来，但仍一无所获。却意外地找到一九四三年我的一本纪念册，封皮已没有，同普通的小记事本一样。翻了一下，早已忘却的往事涌上心头，把我带回少年时代。

一九四一年先君蓝公武从日本宪兵队释放出来后，全家便从北平城内北沟沿庚二十八号搬到西郊成府街红葫芦二号。宪兵队的拷打并未使父亲屈服，他依然宣传抗日，并誓不与当汉奸的朋友往来。全家靠典当度日，把北洋余孽、大汉奸

王揖唐以老朋友身份送来的米面倒在街上。父亲的抗日爱国行动受到华北知识界的敬佩。

父亲要看报，但没钱订报，只好看朋友们的报。我上午到成府街一家店铺取报，拿回家给他看，他看完后下午我再送给订户。我送了半年多报。走到红葫芦胡同口，便看到永远坐在小酒店门前的掌柜郭大胖子，他有个弟弟叫郭二胖子，替燕园住户搬家。郭氏兄弟虽算不得燕大的名人，但燕大师生没有不知道他们的。

拐过小酒店便到槐树街了。顾名思义，街道两旁都是槐树。夏天每棵树上都挂着几条“吊死鬼”。我一边捉“吊死鬼”一边往前走。先到陆志韦先生家。陆先生是著名心理学家、语言学家，担任过燕大代理校长。我按铃，开门的多半是陆太太，但她并不接报，慈祥地把我让到屋里，陆先生走过来接报。他同我没什么可谈的，摸摸头或给我几颗小孩弹的玻璃球。这些玻璃球可能是他孩子们弹过的。陆先生有四子一女，年龄都比我大得多，从来没同我玩过。他们的名字我都记得，但不知怎么写。只会写老三陆卓元的名字，因为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画过一幅水彩画，画的是燕大东大地的一角，上面写着：“文泰（我那时的名字）小弟留念。卓元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”。陆先生除慈祥外没给我留下其他印象，但我却记住了陆太太脚上穿的一双绣花红鞋。一九五二年我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见陆先生和陆太太，陆先生仍非常客气，客气到谦卑的地步，一再握着我的手上下摇摆。我低头看陆太太的鞋，仍

是绣花红鞋，不过已经很旧了。陆先生告诉我他在语言所工作，并给我留下地址，但我没去看望他们。我当时是进步的大学生，岂肯同司徒雷登的同事交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实在幼稚，还有几分内疚，此后再没见过这对慈祥的老夫妻了。

再往前走一段路便到郭绍虞先生家了。郭先生是燕大中文系主任，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流学者。但那时我对他的学术成就一无所知，他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我几十年后才翻阅过。我记得郭先生夏天衣服穿得很少，仿佛赤膊。郭先生同样慈祥，接过报也不同我说什么，有时摸摸头。郭伯母倒同我说话。他们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女孩子们都比我大，我称她们为姐姐，小儿子郭泽宏与我同年，我们能玩到一起。但他同我与其他小伙伴的玩法不同，不到河边捉蜻蜓或到圆明园摘酸枣，而是在屋里画画。大概郭伯母不让他到外面玩。那时街上贴着日本人的宣传画《第五次强化治安》，“皇军”的刺刀指着两个小人：“共匪和奸商”。我们便画一个中国人，刺刀指向“日本和满洲”。姐姐们有时过来看看，夸我画得比泽宏好，泽宏便不高兴了。我的纪念册上有两位姐姐写的话：“文泰弟：愿你永远保持着天真孩子的心，并有着永远的可爱。以宁，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。”以宁是三姐。“文泰小弟：愿你天真活泼的性格永远存在世上，愿你努力读书将来为国争光。之翰志于故都，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黄昏。”之翰应是二姐。从笔迹上看，两位姐姐已经是高中生了。她们现在何处？早已事业有成，儿孙满堂了吧。还记得我这送报的小弟